

※專題演講※

## 西學中用——重讀劉若愚先生 《中國詩學》有感

王靖宇\*

主席、各位與會學者、各位來賓，我能受邀前來參加為慶祝港大中文系（現在是中文學院）成立八十週年所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並作主題報告，感到十分榮幸，也非常高興！我對港大中文系，就是現在的中文學院，總有一份特殊的感情。這是因為我曾有幸於一九九〇、一九九一年連續兩年前來中文系擔任客座教授，講授有關翻譯以及傳統小說方面的課程。那時我剛卸下在史丹福大學擔任多年的行政工作，真是所謂「無官一身輕」，自由自在，看自己喜歡看的書，做自己喜歡做的研究工作。現在回想起來，那一段日子，還有在臺灣大學唸書的四年，大概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兩個時期了。

我今天要報告的題目是：〈西學中用——重讀劉若愚先生《中國詩學》有感〉。我選這個題目，是有一定用意的，一方面是我自己對這個題目有興趣，而且也正好配合這次研討會的主題；另一方面，在座的大概有人知道，劉先生曾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在港大中文系和新亞書院任教，他的成名作《中國詩學》(*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就是在香港期間寫成的，其中部分章節曾發表於現在由港大中文學院與史丹福大學中國語言文化研究中心聯合出版的《東方文化》學刊上。劉先生去世得早，如果他如今仍健在，並且能夠親自前來現身說法，那該多有意義！

劉先生在《中國詩學》中，用當時在英美盛極一時的所謂「新批評」的方法對中國古典詩作了一個全面細緻而深入的分析 and 介紹，自一九六二年問世以來，不但

---

本文為2007年10月5日在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為慶祝中文系成立80週年而舉辦的「東西方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所發表的三篇主題演講中的一篇講稿。

\* 王靖宇，本所學術諮詢委員、美國史丹福大學 Edward Clark Crossett 人文講座教授。

在西方漢學界，就是在西方一般文學界也都引起轟動，影響極為深遠。史丹福大學比較文學系創系教授，也曾當選為美國文學界最大學會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會長的 Herbert Lingdenberger 教授就曾指出，劉先生此書乃是在不懂中文的英語世界介紹中國詩的最具權威性的著作：“*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 has been available in paperback for many years and has served throughout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 as the foremost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oetry for those without access to the Chinese language.”<sup>1</sup> 後來，《中國詩學》被譯為中文、韓文和日文，在東亞學術界也產生過巨大影響。不過，在進一步討論本書之前，我想先作一個有關西學中用的簡單背景介紹。

中國文學發展到了晚清，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一直以來受到正統文人蔑視的小說，突然搖身一變，成了當時知識界的「天之驕子」，其重要性完全凌駕於正統文學中一向最為人尊崇的文和詩。其時居領導地位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改革家如梁啟超 (1873-1929) 等，在政治上的變法努力一再受挫之後，轉而將注意力轉向小說，視之為社會變革和改良的利器。不無諷刺意味的是，他們在當時仍遭鄙視的小說中，看到了民族復興的唯一希望。「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梁啟超在他的著名〈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1902) 一文中如此宣稱<sup>2</sup>。但他也看到，如果小說足以使社會變好，也同樣可以使它變壞。所以，要想使小說達到其預期的崇高目標，就必須對它進行改革。與此同時，他還極力鼓勵小說家們向西方和日本小說尋求模式與靈感。於是，晚清文學界就出現了大規模地翻譯外國——特別是西方——小說的現象。以林紓 (1852-1924) 為例，儘管他不懂外語，但僅他一人就譯出了大約一百六十種外國作品<sup>3</sup>。但無論譯文如何不盡如人意，接觸西方小說仍然是一件有益的事。它向本國作家展示了一個在題材和技巧上全新的前景，他們的作品也就因此而得益。

從文學批評的角度看，與西方接觸而帶來的最大成果是，隨著批評家們對西方文學作品和批評思想的知識加深，他們在分析本國小說時，開始運用這些知識。其結果是增長了新見識，開拓了新領域。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王國維 (1877-1927)

<sup>1</sup> 為紀念劉先生的悼文而作，未發表。

<sup>2</sup> 見阿英編：《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14。

<sup>3</sup> 見 Robert Compton, “A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s of Lin Shu, 1852-1924” (Ph.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71)。

和他的那篇著名而精彩的論文〈《紅樓夢》評論〉(1904)<sup>4</sup>。在這篇論文裏，王國維採用了德國叔本華 (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 的美學原則，首先討論了苦痛如何與人生形影不離，以及一切藝術的終極功能如何是以盡量描寫受苦的過程，以便為讀者提供暫時的感情上的宣洩與慰藉（亞里士多德的餘響）為目的。一件藝術作品的成功程度，取決於它可以為觀眾或讀者提供這種感情上的宣洩和慰藉有多少。依照此一公式，叔本華認為悲劇應該占據藝術世界的首位。王國維認同此一看法，並進一步介紹叔本華如何將悲劇分為三種：第一種是由極惡之人所為者；第二種是由盲目命運釀成者；第三種是「由於劇中之人物之位置及關係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蠍之性質與意外之變故也」；換言之，事情的發展只是出於自然。王國維繼而解釋說，三種悲劇中以第三種感人最深，因為它向讀者表明悲劇並非不尋常或難逆料之事，而是生活本身固有的一部分。他認為《紅樓夢》正屬於此類悲劇，因而它堪稱悲劇中的悲劇。它不僅是中國最偉大的文學傑作，也是世界文學中最偉大的傑作之一。

王國維也許是第一位把西方文藝思想和方法應用到研究中國文學上的學者。如果我們把他的〈《紅樓夢》評〉和諸如脂硯齋、王希廉等人的《紅樓夢》評點放在一起來看，前者所展現的全新視野與看法是顯而易見的，是令人興奮的——這就是西學中用的價值所在。數年前，我在一篇論文中曾說過這樣兩段話：

最後，筆者想談一談用西方文學批評方法來分析中國文學的問題。也許有人會覺得，西方文學批評乃是來自西方文學所特有的東西，而西方文學和中國文學完全是兩種不同的傳統，因此用西方文學批評方法來分析中國文學是很牽強的，有時甚至是牛頭不對馬嘴。其實，這是不必要的顧慮。文學固然因時因地而異，但也有其所以為文學的共同（通）性。適用於分析西方文學的方法並非絕對不能用在中國文學的分析上，反之亦然。重要的是，我們不能武斷，不能意氣用事，發現二者有相異之處時，就任作主觀的價值評估，認為西方文學勝過東方文學，或東方文學勝過西方文學。

我們大概都有學外語的經驗。當我們在學習一種外語時，常不自覺地會把該

<sup>4</sup> 收入阿英編：《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頁 103-124。有關小說在晚清時受到重視以及王國維對《紅樓夢》的看法，可參看拙文：〈阿伯拉姆斯的藝術四維坐標與中國傳統小說批評〉，收入拙著：《金聖歎的生平及其文學批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附錄一。

外語和自己的母語相比較，結果是我們對自己母語的了解也加深了。研究文學又何嘗不是如此。當我們一旦接觸到另一個文學傳統時，不但我們的視野會擴大，我們還會對自己的文學傳統開始反思，並從而產生新的看法和新的理解。這就是所謂「他山之石」，不但不應該排斥，相反，還應該多借鑒才是。……<sup>5</sup>

所以，我是很贊成西學中用的。問題是如何西學中用？如何在使用西方文學觀念和方法時，能避免上面引文中所說的武斷、意氣用事，以致於對中國傳統文學作出不公允的批評？在這方面，我認為劉若愚先生在《中國詩學》乃至於其後的眾多著述中所展示的方法和精神正可以作我們的楷模。

劉若愚先生的《中國詩學》雖然已經問世四十多年了，但至今讀起來仍然很富有啟發，很值得我們借鑒。首先，他非常強調對中國傳統的深入瞭解。正因為如此，他對中國詩學所作的論斷就顯得平實而公允。全書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討論中國文字和語言的特性，談到漢字的語源及意義，中文的聽覺效果，並從而談到中國詩的格式與音節，又談到中國詩的語言及其語法，最後還談到諸如自然 (nature)、時間、歷史、閒適 (leisure)、懷舊 (nostalgia)、愛情、迷酒 (rapture with wine) 等中國人習用的概念和思維方式。第二部分介紹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和理論，將中國傳統詩學理論歸納為四類：道學主義詩觀 (didactic view)，個性主義詩觀 (individualist view)，技巧主義詩觀 (technical view)，妙悟主義詩觀 (intuitionist view)，並分別舉例加以闡釋。「妙悟主義詩觀」，在劉先生後來的著作裏改稱為「形上主義詩觀」 (metaphysical view)。一直到書的第三部分，劉先生才真正運用「新批評」慣用的所謂「語句分析」 (verbal analysis) 方法去分析一些古詩作為實例。在分析中國作品的過程中，劉先生不時引用西方作品來比較。在進行中西詩的對比時，他和其他一些學者一樣，注意到中國傳統裏缺少了西方傳統引以為傲的史詩和悲劇，但他並未因此就認為這是中國詩的大缺陷，反而嚐試從中國語言、中國人的心態以及人生觀等方面來探討並解釋此一現象。劉先生的結論是：儘管中國詩中沒有像荷馬的《伊利亞德》、但丁的《神曲》那樣宏偉的個別巨著，也沒有像希臘悲劇《伊底帕絲》、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那樣深刻的個別作品，但就整體而言，中國詩中所展現的

<sup>5</sup> 〈怎樣閱讀中國敘事文——從《左傳》文藝欣賞談起〉，收入拙集：《中國早期敘事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引文見頁95-96。

視野也是同樣的廣闊，所表達的思想和情懷也是同樣的深刻，而在觀察的敏銳、感覺的細緻、表達的含蓄等方面，中國詩較之西方詩則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中國整體詩學中所展現的豐富而多彩多姿的人生，完全可以與其他詩學傳統媲美。用他自己的話說：

However, despite the lack of epic and tragedy, Chinese poetry as a whole is not more limited in scope or less profound in thought and feeling than Western poetry. Though we may find it hard to name an *Iliad*, a *Divine Comedy*, an *Oedipus*, or a *Hamlet* in Chinese, the entire body of Chinese poetry presents as rich and varied a panorama of life as any other poetry. While Chinese poetry may fail to compare with Western poetry for magnitude of conception and intensity of emotion, it often surpasses the latter in sensitivity of perception, delicacy of feeling, and subtlety of expression. As an exploration of life, it can lead one into worlds unknown or unfamiliar to Western readers; as an exploration of language, it presents a fascinating display of verbal ingenuity and flexibility, with a distinct music which may sound bizarre to Western ears but which has its own charms to those attuned to it.<sup>6</sup>

劉先生這種為取得公允論斷而設身處地去深入理解中國傳統的手法和精神，可以說是《中國詩學》的一大特色。

《中國詩學》另一個重要特色是：劉若愚先生的研究路向並不僅限於以西方的理論和方法來重新分析及評估中國詩學，他的最終目的不僅僅是為了讓西方讀者更能理解並體會中國詩的精髓，而是如何融合中西方的詩學觀念，從而建立起自己的詩學觀。所以，在書的第三部分第一節裏，劉先生就談到何者為詩以及如何分辨詩的好壞等一般性問題。同樣地，在他後來比較偏重的文學理論研究上，他借用西方理論來重新整理中國固有的文學理論，他的最終目的不僅僅是能讓西方讀者也能看到一套在另外一個不同文化背景裏所產生的理論系統，而是建立一個能超越不同文化與歷史傳統的更為普及的一般性文學理論。他在他的《中國文學理論》(*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裏寫道：

Having made due allowances for differences in beliefs, assumptions, prejudices, and ways of thinking,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different ages, we must aspire

<sup>6</sup> *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2), pp. 155-156.

to be transhistorical and transcultural, searching for literary features and qualities and critical concepts and standards that transce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Otherwise we should no longer speak of “literature” but only of discrete “literatures,” nor of “criticism” but only of “criticisms.”<sup>7</sup>

這當然都是十分崇高的目標，要達到並不容易，但是有這樣的目標是很重要的，因為只有這樣方能看出中國詩學與文論也有寶貴並足以對世界文學有所貢獻的地方。也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所謂「歐洲中心」(Eurocentrism) 或「中國中心」(Sinocentrism) 一類的狹隘傾向。

劉若愚先生的《中國詩學》所展現的第三個重要特色，在今天看起來尤其具有意義。雖然他在書中討論到中國文字和語言，中國傳統文論，還有中國哲學、人生觀等等，但他的注意力自始至終都放在詩的本身；談其他問題也只是為了要增加我們對詩的理解與欣賞，如此而已。毫無疑問，他是把文學當作美學對象，當作藝術來看待的。《中國詩學》一名是先生自己訂的，其實，書的英文原名 *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 大可譯為《中國詩的藝術》。他後來在一九七九年出版的一本中國文學簡史叫作 *The Essentials of Chinese Literary Art*（《中國文學藝術精華》），而非 *Essentials of Chinese Literature* 或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之類。

我前面說過，劉先生在寫《中國詩學》時，深受新批評學派的影響，而新派最大的特色就是把文學當文學來研究，不太注意文學以外的東西，所以他在本書中集中把詩作文學來研究是很自然的事。但後來他對現象學開始有興趣，並且也深受其影響，然而他的注意力卻仍然集中在文學本身，對文學界大量採用與文學並沒有很大關係的其他理論甚不以為然。他在一九八二年出版的《語際批評家》(*The Interlingual Critic*) 一書中就認為，把文學作文學來研究仍然是恰當的辦法，其他諸如人類學、心理學、歷史學、語言學等等方法，都只能使我們離文學越來越遠。他說：

To return from the ridiculous to the sublime or at least serious: it may be true that, as E. D. Hirsch has argued, the so-called intrinsic study of literature is really the aesthetic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no more intrinsic to the nature of literature than any other approach. However, I still think, as does Hirsch himself, that this is the most fruitful and rewarding approach, because it focuses on the literary work itself,

<sup>7</sup> James J. Y. Liu, *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p.140.

without necessarily neglecting its relations to the world, the author, and the reader, whereas some other approaches tend to lead the reader further and further away from the literary work and more and more into realms of sweeping generalizations about anthropology, psychology, history, linguistics, and what not. To be sure, these are all valuable academic disciplines and branches of human knowledge, but if one is primarily interested in one of these, why should one choose to be a literary critic?

It is perhaps necessary to reaffirm one's belief in the value of literature and that of literary criticism, when there is so much trendish talk about "deconstructing" literary texts, about the nonexistence of literature, and about the impossibility of interpretation...<sup>8</sup>

劉先生逝世已二十一年了，如果他仍健在，對充斥當今文學界的文化研究不知又會作何感想——因為從文化研究角度來重新審視文學作品的流弊不但使我們離文學越來越遠，有時甚至於澈底否定了文學獨立存在的價值。過去幾年來，史丹福大學一直在物色一位現當代中國文學的教師。有一次，一位應徵的學者前來演講，幾乎全部時間都在談留聲機如何傳到中國的歷史。難怪一位同學事後私下就問：「這和現代文學有什麼關係？」這只是一個例子，但很可以說明，中國文學——尤其是現當代中國文學——研究，在文化研究的衝擊下已經走入偏鋒。

史大有一個學術單位，叫作：「現代思想與文學」(Modern Thought and Literature)，它不是一個學系，而是一個跨學科的學術單位 (program)，以訓練研究生為主。上世紀七〇年代初，我剛到史大任教時，它的學術目標，顧名思義，乃是為了探討思想與文學之間的關係，可說是文學與思想並重。但如今它的學術重點卻完全變成了文化研究，而文學則只是文化研究中的一部分而已。前兩年有記者問及「現代思想與文學」作為一個學術單位的性質時，當時的負責人說得很清楚：“We don't really put literature at the center but rather as part of a larger scheme of things. And the way we approach literary texts is not so much for their literary historical value or as an aesthetic object, but rather as a piece of evidence from which we can get at certain kinds of social

<sup>8</sup> James J. Y. Liu, *The Interlingual Critic: Interpreting Chinese Poet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75-76.

and philosophical problems.”<sup>9</sup> 意思就是說，該學術單位的研究取向已不再把文學作為主要對象之一，而是將之視為一個更大的研究領域中的一部分。他們不再把文本當作美學對象來看待，因為他們認為文學只是為研究一些社會和哲學問題而提供一些例證而已。很諷刺的是，想當年新批評的大師們，他們之所以不遺餘力地去推動從文學來看文學的主張與方法，一個重要的考慮就是要把文學作為一個學科、一個獨立的學術領域來研究，而不再是歷史或哲學等其他學科的附庸。然而曾幾何時，竟有後人執意要摧毀他們當初辛苦建立起來的一個學術領域，又要把文學淪為其他學科的附屬品了。我們不禁要問，如果大學裏還有文學系的話，那麼文學作為一個學術領域，不還是應該有它自己的特性，有它自己一套與眾不同的研究方法嗎？

許多年前，我在一本文集的〈自序〉裏曾說過一段話，那雖然只代表了我自己對西學中用的看法，但也頗能轉達劉若愚先生在《中國詩學》甚至於他後來的許多著作裏所展現的治學理念。我和劉先生朝夕相處了十七年，經常是「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我們對文學的看法是相當一致的。現在我把這段話唸出來，就算是這篇報告的結語吧：

也許因為我原先學英美文學的，所以在討論中國文學時，常不自覺地採用東西文學比較的觀點。當然，有時候我也有意這麼做。因為西方一些理論家在討論所謂「一般文學」(general literature)時，事實上仍只以西方文學為實例。因此，在文學理論的建立上，如何將歷史悠久而又自成一體的中國文學納入世界文學主流，就成了我多年來研究中國文學的主要目的。正如在其他學科領域內一樣，西方的文學理論家們也發展了一套文學的術語，為了讓這些人多了解中國文學的特色和精神，使用一些他們的語言和分析方法，就很有必要了。不過，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在運用西方文學的一些觀點和方法來討論中國文學時，主要目的應該是為了找出中國文學的獨特之處，再進而建立一套較有普遍性的文學理論；而不是為了標新立異，將一套並不太適合中國特有情況的理論和方法強加於中國文學之上。<sup>10</sup>

<sup>9</sup> *Stanford Report*, April 9, 2003, p. 5.

<sup>10</sup> 王靖宇：《左傳與傳統小說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2-3。